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7BJY169) 最终成果

农贷配给、农户意愿与农业资本市场

——基于农户调查、农贷与资本市场数据计量分析

刘明◎著



科学出版社

农贷配给、农户意愿与农业资本市场

—— 基于农户调查、农贷与资本市场数据计量分析

Agricultural Credit Rationing, Farmer Willingness
and Agricultural Capital Market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Farmer Household, Agricultural Loan and Capital Market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与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基于西部贫困、不发达地区的研究（07BJY169）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刘明◎著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传统农户、过渡型农户、两栖型产业工人、城市“新贵”、新农场主和“土著”企业家构成当代农村新的社群与阶层谱系，决定着金融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和多重复杂性，金融体系必须依附村庄信用生存。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结构也由之呈现一系列特征，预示着农户从“生存小农”向“理性小农”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正在酝酿重大变革，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本书第一篇对农村信贷配给绩效做计量验证，对农村民间金融从制度演进视角分析。第二篇对农业资本市场效率和市场预期做实证研究，对围绕农产品价格调控与期货市场监管的争论予以剖析。第三篇依据农户调查数据揭示农贷配给特征，刻画农户借贷偏好与跨期选择机理。第四篇选择金融创新、金融风险管理和微小金融视角评介国外农村金融发展，探索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全书基于田野调查和计量验证，尝试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分析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制度内涵的揭示及改革趋势的预判具有客观理据。

本书可作为金融理论工作者、金融管理部门及金融业界人士的参考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贷配给、农户意愿与农业资本市场：基于农户调查、农贷与
资本市场数据计量分析 / 刘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03-040542-5

I. 农… II. ①刘… III. ①农业贷款—关系—资本市场—研究—中国 IV. ①F832.43②F8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9923 号

责任编辑：方小丽 / 责任校对：刘文娟
责任印制：李 利 / 封面设计：王 琳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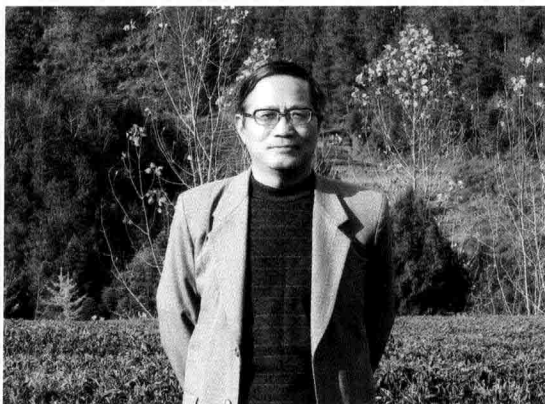
2015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4 彩插 12

字数：519 000

定价：1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刘明，男，1954 年出生。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恢复高考后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实验专修科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运筹学研究班（金融工程方向），经济学硕士。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经济学会副会长、西安市政府专家咨询团特聘教授。代表作有《转型期金融运行与经济发展研究》《农村金融体系重构与西部金融发展若干问题研究》《货币金融学导论》《论利率运动规律——对马克思利率理论的重新探讨》《马克思所有制理论若干范畴译名与释义考辨》《现代资产选择理论及相关检验评析》《论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解读“美国式危机”》等。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与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基于西部贫困、不发达地区的研究”、教育部项目“预期、不确定性与最优货币政策研究”、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西北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金融支持体系研究”等省部级项目十多项。获陕西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和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12 项。近年先后参加世界经济秩序变革与东北亚经济合作（首尔）、2010 金融风暴后两岸经济发展（高雄）、第四届亚洲经济共同体论坛（仁川）、中国与越南经济改革比较高层论坛（河内）等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发表观点引起重要学术反响。

序

也许十年间经历两次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危机才使人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门”所在。尤其美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大佬”，在酝酿危机的漫漫长夜——在当时看来是散射着五光十色、有无穷魅力的永不落的清晨——谁能够知道其中浸透和隐藏着多少金融与资本运作的秘密？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英国早期的远洋贸易、美利坚历史上的筑路高潮，无法忽略英法两国有过 200 年梦想当代才修成正果的英吉利海峡隧道。金融是这些人类活动伟大壮举背后的灵魂。

葛拉西安讲述自然之物都会达到至善境界，随后开始衰落，人工之物能臻于至善者万不有一。金融是自然之物抑或人工之物？马克思认为货币体系演进是一个均匀连续的自然过程，即从商品货币发展到黄金和白银铸币，再到纸币这种没有价值含量的名义货币。如果坚信此说就会发现中国货币史的诡异怪诞，中华子民在先秦就曾经使用黄金货币，但是从秦开始历朝改用青铜铸币，到 11 世纪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使用纸币的国家，越过了以黄金和白银为货币的阶段，到了元代这一情况有所改变，到清代时白银货币又大行其道。用控制货币数量促进交换减少饥荒，是祖先的节俭传统和吝啬，抑或是贵金属藏量和开采之先天不足？借助手中的权杖赋予低值货币或者纸币以价值是古代君主的圣明。如此看来，金融是自然与人工的复合体。那么，美国金融体系是否曾经达于至善，是将面临至善之后的衰落，还是能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继续臻于至善？当然，人们更为期待的是后者。

我们应该反躬自问：中国金融体系何时臻于至善？如何臻于至善？即使危机隐喻着盛极而衰，金融发展祸福相倚，比起贫困潦倒平庸的波澜不惊，人们是否宁可选择丰饶富庶逍遥中偶尔邂逅危机的洗礼？宁静淡泊毕竟是那些行止高远的隐者贤士向往的情调。笔者与业内人士讲过金融业是“火中取栗”，一国的金融发展、货币控制大凡也如此。为了拯救风雨飘摇中的美国，伯南克宣称不惜乘着直升机撒钱，这时他心中总归难免有几分惶恐。一国金融体系果若能够达至至善至美，穷极其利而独避其害，恐怕就需要无数个联立方程，精准计算所有输入和输出变量，特别难为的是所有机构与个人需要按照模型指派行事，起跑行动的时间完全遵从安排，这还未计域外夜以继日全天候的金融流动滋扰。不过，所有这些都不会令经济学术和金融家感到沮丧失意，因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理论才



会持续演进，政策管控艺术才像是指挥一个庞大乐队而不是弹奏一把单弦琴。我们追索的可能是一路落英缤纷、寒星明灭没有终点的旅程，而非一劳永逸可以停泊的港湾。

如果对经济学历程加以回溯则不难发现，随着改革洪流汹涌喷发，中国经济学者几无例外地遵循着现实经济问题的导向模式，这种“问题”导向也伴随着改革大潮的冲刷发生巨变。传统体制条件下盛行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形而上考据经典的研究范式，开始出现分野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的讨论，接踵而至的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论战，对市场经济与公有制能否兼容的纠缠不休。这些争执自十四大宣告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而尘埃落定，因宪法修正条款明确维护私产而画上句号，因国人的经济学智慧创造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心照不宣，也就终止了经济学家的厮杀火并。由此，中国经济学进入了超越围绕传统政治经济学话语论争的“后经典时期”。当围绕经典纷争论战时，学者们就像是群雄并起挤在一根独木桥上，都急于扯出标榜自家的旗帜，问题空前地集中，经济学也似乎无须分科，一旦过了这根独木桥，对岸即是万木霜天的世界，经济学群体顿然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面对的是一座迷宫而非一眼望穿的便道。现在已经很难用“某市场”“某股份”对一位经济学家概括塑型礼赞其卓然不群的功绩，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书写宏大叙事、史诗般的引起万众瞩目的经济学主题甚至成为一种奢望。或者，这种“主题”已经不是未被发现的所谓“问题”，而是种种问题背后若干理论命题。改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济事务的波澜壮阔呼唤的似乎是应急的经济工程设计而不是基础理论攻坚，经济学战国的烟云弥漫诱惑经济学家难得沉潜于书香斗室一隅。也许，有为数不多的中国版的古诺、科斯、纳什、格兰杰等正执着遁形于闹市之外，就如玩赏魔方一般自我编织新的话语，在经济学盛宴另一边的荒原刀耕火种；抑或有一些本土或“海龟”学者经历走出传统、经典之后又挣扎着扬弃“主流”、重拾经典而另眼看世界，完成一轮否定之否定的轮回。他们是饶有兴味的旁观者和窥视者，苦心经营将东方大国的跌宕沉浮转换为营养个体思维的乳汁能量，伺机在经济学王国揭竿而起重定乾坤。何时，甚至可否到达彼岸，他们也未自知，仅心无旁骛而自顾追索。

大凡金融危机总是社会所积累的货币资金或者金融体系创造的流动性在某一（些）特定领域过度集中，从而扭曲性地推高资产价格，而后被人们识破夺路逃逸又急速跌落的直接后果，郁金香热、南海泡沫、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目前仍在发酵的滥觞于美国式危机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均如此。当然，我们可以将金融危机的因由追溯到社会畸变的财产所有权及收入分配，这两者极易引诱社会资金流动格局与金融资源配给失衡，失衡遍布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一国内部的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行业 and 不同市场。不过，我们更为关注财产所有权、收入分配以及金融资源配给在城市与乡村、富人

与穷人之间的失衡状况。假如不能较快地改变所有权配置与收入分配制度,改良之策可能就是平衡金融资源配给。其实无论东方与西方,财政与信贷均是在不改变基本社会结构和制度约束条件下调节与平衡财富分配的手段。例如,政府给予居于穷乡僻壤的人们超出自己财富水平的额外的运用货币的权利,无疑是给予他们重要的经济机会,赋予他们选择和把握自己命运的自由,即使在现代工商业激烈的竞争中,他们也能够找到创造财富的门径,因为一些产业或者维持家计的“营生”可能只适合在乡村环境也即在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隙缝中生存,不排除一些产业离不开农村相对“丰裕”的土地要素。这就给了农人难得的机会,这种机会只有具备一定数量货币资本的原始推动才能够成为事实。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从改革初期至目前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1.27%,2013年下降到10%。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产业结构变化必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以及农村内部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根据课题组2013年在陕南商洛市五县一区 and 汉中市留坝县、勉县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发现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呈现一系列特点。主要包括:第一,传统种植业在家庭生产结构中占比下降,农地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功能犹存但地位弱化,经营土地成为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力的途径。第二,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进城务工收入。务工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77.41%,在城市经营个体企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2.51%,经营土地收入占比8.69%,养殖业收入占比1.58%,农户在本地从事商贸物流业收入占比3.04%。第三,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如果按照收入来源系数折合实际劳动数量计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率为79.92%^①。第四,农户总支出中以建房支出与生活支出为主,生产性投资支出甚微^②。

对调查数据观察提出的问题是:黄宗智描述的中国小农的“拐杖逻辑”是否仍然成立?未来农地经营有无向规模扩大的家庭农场或者农业公司经营变化的可能?农村劳动力有无在当地创业的扩张冲动?也即农户是否有从“生存小农”“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转变的趋势?答案或许就隐含于数据、事实之间。换言之,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已经开始酝酿一场重大变革?对这一

^① 即将务工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例与在城市经营个体企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例加总(79.92%),近似等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率,或可称其为有效转移率。简单按照劳动力数量衡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率为55.6%,由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要为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妇女,这一数字明显低估了实际转移率。

^② 笔者于2013年8~10月带领研究团队师生先后到陕南商洛市、汉中市农村调研,入户调研地区包括商洛市商南县富水镇、镇安县云盖寺镇,汉中市留坝县城关镇和留侯镇,勉县同沟寺镇、阜川镇,收集入户调查问卷798份。书中所列数据根据调研问卷整理。

问题的回答也就回答了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创新是否具有新的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问题。

贫困地区农村社会阶层正经历如下分化：第一，少数仍以种植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户和大部分以务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分别被称为传统农户与过渡型农户）；第二，部分农户已经放弃农业耕作而成为城市新的两栖型产业工人或者经营个体企业的城市“新贵”；第三，依靠转承包土地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农场主和经营商贸物流与小型工业的“土著”企业家。农村金融制度设计必须依据带有明显转型与过渡特点的农村经济与社会运行特征。需要分析判断：由于过渡型农户、两栖型产业工人、城市“新贵”在农村社会阶层中占有绝对比例，这些阶层又属于农村资金的主要盈余方，由之形成农村资金大量向城市转移的格局今后是否会发生变化？相应变化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如何？上述变化对农村金融体制提出的内在要求是什么？随着农村人口规模、生产结构与收入结构变动，农业生产的资本与技术配置水平变化对金融体系提出新的要求，金融系统该如何适应？

理论分析与制定政策需要直面的贫困地区农村经济金融运行的矛盾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传统农业停滞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矛盾。改革以后恢复具有小农经济特点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在解决温饱以后制度绩效已经被充分释放，发展现代农业则需要突破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但是，无论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家庭承包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态，还是政策承诺现有农地制度长久不变，均说明对突破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路径探索极为艰难。

二是正规金融部门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矛盾。贫困地区农村的正规金融体系依靠国家信誉及其合法性大量吸储，但并未发挥好优化配置农村金融资源的主体功能，由动员储蓄、融通资金功能退化为主要单向吸收存款的自我封闭式经营，对具有信贷管理优势的非正规金融形成排斥效应。

三是传统存量金融改革与新型增量金融内生发展的矛盾。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一直是矛盾的焦点，而当下农村已陷入存量改革难与增量发展受压制的双重困境。2006年年底我国开始试点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至今举步维艰。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思路是将其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其效果仍具有不确定性。

四是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矛盾。即如何界定贫困地区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服务范围，如何明确划分两类机构并厘清支持政策性金融与规范商业性金融发展的途径与机制。这些问题迄今没有完全解决。

五是政府外生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与民间金融内生演化的矛盾。政府职责在于两方面：其一，制定并实施农村金融业的交易规则和进入与退出门槛；其二，确

定政策性金融活动范围及其发挥作用的途径与方式。政府越位可能成为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创新的羁绊。

六是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与农业高风险特征的矛盾。在种植业、畜牧养殖业等农村经济领域农业保险覆盖不足甚至存在空白。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必须直面以下三大难题：其一，自然原因（主因）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其二，由于分散而复杂的农业领域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其三，在农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保险供给与需求双重不足。

七是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的矛盾。政府对农村的金融监管力量投入有限，监管能力不足，适应农村社区特殊的乡土信用文化的监管框架与规则尚未臻成熟。需要探索在农村金融领域如何实现差异化监管使监管体制与机制适应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需要。

八是贫困地区农村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的矛盾。这一问题是老生常谈，但老问题被发展的实践赋予新形式：农村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的矛盾表现为金融机构“放贷难”和农户“借款难”并存。农村金融机构可贷资金数量与规模约束已经消失，却面临新的难题。

九是金融机构追求利润动机与贫困群体合理金融需求的矛盾。无论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推动的国家扶贫贷款，以及由国际组织、第三方组织和民营金融机构推广的小额信贷，均出现对农村贫困户的排斥效应，即所谓小额信贷的“偏离”问题，导致金融扶贫与减贫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要解决以上问题，一要立足全局冲破传统体制的羁绊，坚持不懈地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二要相信与依靠农村社会所蕴蓄的金融组织资源和民间金融力量，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三要客观、科学地认识贫困农村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与城市和发达地区农村的差异化特征，因地制宜地对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创新“松绑解困”，促使其加快发展。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伴随着总体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尤其表现为在原有“存量”金融组织以外引入新型“增量”农村金融机构，推动包括农产品期货与农业上市公司的农业资本市场发展，对农村金融交易机制与工具做新的探索。这种变化从其影响的领域、范围和效果观察仍然具有很大局限，农村多元金融组织、多样化金融工具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服务不充分甚至出现金融服务空白的局面没有被完全打破，其结果是农村信贷资金供给和农业资本形成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抑制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瓶颈。不过也应该注意到，管理层提出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地位提高到“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意味着农村金融新格局具有丰富的演化能力，农村金融组织、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发展方兴未艾。缘由即在

于：其一，金融制度层面与政策设计必将倾向于宽松，释放出的能量必将使农村金融体制变革及农业生产绩效提升获得必要的制度层面支持；其二，由城镇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进步驱动的农业生产要素比例改变——包括单位劳动力所支配资本和土地增加，以及第一产业内部结构转变将会产生大量有效的金融需求。制度松弛和适当放松规管将促使内生性金融发展，结果将诱致出“需求创造供给”。

农村谋变，道路维艰。但我们相信，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举措在农村有效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必将不断取得进步。历史必将见证一个适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能够支撑农村经济社会长治久安良好运行的日臻成熟的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金融改革必将为我国宏观金融改革乃至总体市场体制改革取得具有革命意义的大跨越谱写出独特的壮丽诗篇。

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当代农村和农业金融，许多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源于在陕西、青海两省贫困农村地区入户访谈数据以及与金融机构和乡村基层干部广泛深入的讨论交流。相关工作无疑是经济金融学术之旅和接力的一个片段、一个插曲，在一些环节可能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尽管不乏极为艰苦的探索，但是未必每一处结论和政策构想都是适切的，竭诚欢迎学界同仁商榷补正。笔者对书稿做了反复修订，即便如此，由于不同章节研究方法和谋篇布局构思不同，行文风格未必完全统一，对研究结论的提炼也未臻清晰完美，敬请读者批评！

研究工作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与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基于西部贫困、不发达地区的研究”（07BJY169），也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资助。谨致谢忱！

刘明

2014年9月14日

目 录

第一篇 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农贷配给

第一章 农业信贷绩效与农贷组织选择	3
第一节 解读农贷“悖论”	3
第二节 资金流内敛与农业经济增长	16
第三节 析合作理性与西部农贷组织选择	31
第四节 农村金融监管约束与创新	43
第五节 改革趋势	49
第二章 农村民间金融契约治理与需求分析	56
第一节 农村民间金融市场契约治理	56
第二节 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绩效评价	63
第三节 农户民间金融需求影响因素	68
第四节 制度进化、嵌入与分层	78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农村民间借贷利率	82
第一节 民国时期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分布特征	82
第二节 民间借贷利率形成机制：一个比较视角	98
第三节 实证检验	101
第四节 结论与政策含义	111

第二篇 农产品期货市场与农业上市公司效率

第四章 农产品期货市场效率与宏观变量趋势	117
第一节 中国农产品期货风险溢价与市场效率	117
第二节 农产品期货套期保值绩效实证分析	132
第三节 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波动	141
第四节 结论兼及对相关争论的思考	165
第五章 农产品期货市场通货膨胀预期行为	172
第一节 期货市场的多重功能	172
第二节 通货膨胀预期研究述评	174



第三节	期货市场预期模型构建	179
第四节	计量检验	184
第五节	分析结论	195
第六章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效率 CAPM 检验	200
第一节	研究述评	200
第二节	效率检验方法	203
第三节	农业上市公司效率检验	208
第四节	农业上市公司效率影响因素	218
第五节	提高农业上市公司效率的对策	225

第三篇 西部贫困农村经济金融田野调查

第七章	贫困农村经济机会、关系型融资与农贷配给	233
第一节	体验现场“隐喻”必亲历“田野”	233
第二节	调查方法与样本分布	236
第三节	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240
第四节	农户贷款用途与创业意愿	243
第五节	机构贷放行为与农户融资偏好	248
第六节	农村非正规与正规金融特征	256
第七节	本章小结	262
第八章	西部贫困地区农户借贷偏好与跨期选择	267
第一节	农户借贷偏好和跨期消费-投资	267
第二节	农贷市场供求关系分析	272
第三节	农户储蓄 Tobit 回归分析	282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84

第四篇 国外农村金融发展：案例与经验

第九章	国外农村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	289
第一节	农村金融组织形态	289
第二节	新型农业融资工具	300
第三节	农村金融风险管理	310
第四节	他山之石何以攻玉	321
第十章	国外贫困、不发达农村微型金融	326
第一节	贷款产品设计	326
第二节	经营管理	333

第三节 政治因素的影响·····	343
第四节 借鉴意义·····	347
参考文献·····	354
附录：乡行散记·····	366
后记·····	371

第一篇

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农贷配给

农业信贷绩效与农贷组织选择

本章集中讨论和评价我国农业信贷对农业经济及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果，在此基础上考察农业信贷组织选择和农村金融监管问题。第一、二节分别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业信贷作计量分析，按照全国总体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种范围，论证改革期间农业信贷、农业财政投入等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效果，概括农业信贷和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为增加农业资金投入的体制模式与途径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第三节将当代中国农村面临问题归结为土地问题、政权结构与金融安排的制度松弛态，对合作金融所具备的优势和农村金融改革背离服务“三农”的倾向做了分析，提出政府应及时推出相关政策支持内生合作金融发展。第四节对政策松弛情况下农村新的金融机构格局做出前瞻，提出解决农村领域金融监管法规滞后、监管基础薄弱等监管难题的途径，强调重点致力于明确监管边界，区分农村与城市差异制定不同的监管准则。

第一节 解读农贷“悖论”

一、引言

我国收入分配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农业与工业、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改革以后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区域间的矛盾又主要是城、乡之间或者工、农业之间矛盾的一种反映，因为在西部农业份额较大，工、农业收入差距必然转化成区域间差距。所以，解决工、农业两个部门生产、分配关系的失调问题成为解决国民

收入分配关系失调的焦点^①。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在短期甚至长期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必须通过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部门参与经济增长所创造收益的分享能力,跨越中西部大片地区仅仅依靠传统种植业和人均一亩方田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格局。由农民自发诱导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向以农户为主体的小生产农业经营方式的一种复归,这种过渡安排是以准“还原”的方式对生产关系的改良,对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仍然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也从而形成对农业部门创造剩余的约束。改变农民的经济生存状态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农业基本经济制度,大幅度增加农业部门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驱动农业生产要素比例改变,发现、诱导、支持和培育农民企业家,以资本、技术推进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实现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农民收入增加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内涵与外延扩张以及市场交换过程。

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央政府尤为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直接体现就是政府的各种支农政策,包括农业财政支出和农业贷款等。这些政策举措对农业发展的正向激励如何?是否改善了农业资源及一般资源的配置,即这些举措是体现出经济效率还是非效率?国内研究农民增收问题多从扩大农业投资的思路加以分析,我们则主要从农业投资的效率角度分析一系列现象(抑或是悖谬)后面所隐含的制约农民增加收入的潜在机理,换言之,我们试图发现阻碍农业生产力进步的某些重要因素。从社会与经济综合的角度考虑,农业投资效率可以由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数量关系加以判断。除了分析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与农民收入的一般关系之外,本节主要关注对通过计量方法所发现的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间的反常关系做何解释。本节中使用计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对农民增加收入无效。如果根据理论和直觉判断与根据经验验证分析对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做出取舍,结果是“非此非彼”或者“亦此亦彼”,所以称其为“悖论”^②。

国外学者对相关国家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分歧。Binswanger 和 Khandker (1995)对印度 85 个农村的调查发现,供给主导型的农业贷款导致了非农就业的迅速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Khandker 和 Faruquee(2003)研究了巴基斯坦农业发展银行的农业贷款,发现贷款改善了农户的福利状况。Swinnen 和 Gow(1999)认为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产生了高额交易成本,造成了信贷的低效率。Diagne 和 Zeller(2001)对马拉维贫困户

① 这并不排除缩小区域间差距同时需要加快发展落后地区的第二、三产业。

② 这一结果与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相关比率的分析也相抵牾,对 1978~2005 年数据的分析表明,中西部金融相关比率是经济增长的 Granger 原因。见:宋翠玲,对我国区际经济与金融差距关联性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0):120~130。